

秦雍城发现春秋时期秦国大型建筑遗址



瓦窑头建筑遗址

雍城是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秦国的都城，也是秦国建都时间最长的都城。秦雍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城南，由城址、秦陵园、中小型墓葬及城外离宫遗址、祭祀遗址等部分组成，总面积约50万平方米。

瓦窑头建筑遗址位于秦雍城城址东端。遗址现处于台地上，东侧为东风水库，南、西、北侧由于村民取土形成断崖。台地南北长182米，东西宽74米，高出周边2~6米。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后，2022年6月至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春秋时期大型建筑遗址1座，出土器物标本500余件。

春秋时期大型建筑遗址仅存基础部分，由南北向建筑与东西向建筑组成，平面呈曲尺形，方向289°。

南北向建筑发掘长度96.5米，宽14.16米。建筑基础由3道南北向平行的夯土墙组成，由西向东依次编号为Q1~Q3，发掘长度分别为28.7、71.1、96.5米。夯墙南端均延伸至台地断崖处，至断崖处的长度分别为49.9、83.1、116.7米。Q1、Q3宽1.3米，Q2宽0.96米，间距均为5.3米。3道夯墙南北各为一个整体，未发现断开。Q1、Q2之间有东西向隔墙2道，宽度均为0.7米。夯墙之间堆积有大量建筑材料，北部较南部高，厚度0.1~0.2米，主要为春秋时期槽形板瓦、筒瓦、半圆形瓦当等。建筑材料堆积层下有踩路面，为建筑使用时的室内地面，北部较南部高0.65米。推测南北向建筑原来连为一体，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建筑整体北部较南部高0.65米，高差处在距北端62.4米处。

东西向建筑位于南北向建筑北端，二者垂直相接，发掘部分东西27.7米，南北20.9米。建筑基础由4道东西向平行的夯土墙组成，由南向北依次编号为Q6~Q9。发掘长度分别为15.4、16.7、18、26.3米。夯墙西端均延伸至台地断崖处，至断崖处的长度分别为17、19、20.3、28.2米。夯墙宽度1.05~1.45米。Q6与Q7、Q7与Q8间距均为5.8米，Q8与Q9间距4.2米。东西向建筑区域瓦砾堆积较少，Q7与Q8间有小面积的踩路面。推测东西向建筑可能为两排房屋，Q7、Q8之间为庭院。

夯土墙残存高度0.14~0.2米，墙基厚0.4~0.9米，夯层厚0.06~0.08米。部分夯墙发现壁槽，分布不规则，平面形状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宽0.3米，进深0.36~0.48米，残深0.35米。夯墙及室内地面之下有修建建筑时的垫土层，厚薄不一，最厚达1.6米。

建筑东侧7.1米有一道与南北向建筑平行的夯土墙，编号Q10，应是建筑的东围墙。发掘长度29.8米，宽1.25米，残高0.1~0.3米，基础厚0.3米。建筑与东围墙之间有0.03~0.05米厚的踩路面，较建筑室内踩路面低0.45米。

建筑下压有时代稍早的遗迹，暴露出来的有红烧土面1处、水井2口。红烧土面附近出土了数量较多的制作车马器的

泥范及制作骨器的鹿角、牛角等原料。为了遗址未来的保护展示，未向下进行大规模发掘。

此外，遗址中还发掘出时代晚于建筑的东周时期灰坑6座、灶坑3座；汉代灰坑4座、墓葬2座；唐宋至明清时期房址4座、道路2条、水井1口、水渠1条、灰坑16座。

遗址出土器物以春秋时期建筑材料为主，均为泥质灰陶，主要有槽形板瓦、筒瓦、半圆形瓦当等。在建筑材料表面发现大量刻划符号，数量达183件。槽形板瓦一端宽，一端窄，瓦面略呈弧形，两侧向上圆角折出，切割痕迹明显，截面呈凹槽形，表面饰绳纹。筒瓦瓦背饰以凹弦纹隔开的绳纹带及素面带，相间分布，瓦沟素面。刻划符号既有文字“五”“十”“又”“工”“木”“火”等，也有难于辨认的符号。部分文字或符号出土有多件，形制相同。刻划符号长1.3~6.6厘米、宽1~5.4厘米。这些刻划符号可能是物勒工名的早期形态。

瓦窑头建筑遗址出土的板瓦、筒瓦及瓦当等建筑材料，制作工艺较为原始；板瓦、筒瓦两侧边缘凹凸不平，切割痕迹明显；槽形板瓦瓦面带有弧度，两侧圆角折出；筒瓦瓦沟泥条盘筑痕迹明显，与瓦当相接处有手指抹痕。出土的刻划符号部分与秦雍城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出土的相同，表明二者时代相近。后者出土的建筑材料尺寸更大，制作工艺进步，出现了两端宽度接近的槽形板瓦，瓦面平整，两侧直角折出。马家庄一号建筑群的时代为春秋中期，废弃时间为春秋晚期。结合秦雍城迁都雍城的时间，“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初居雍城大郑宫”，确定瓦窑头建筑遗址的时代为春秋中期早段，稍早于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是目前发现和确定的秦雍城时代最早的建筑遗址。

瓦窑头建筑遗址规模大，残存面积近2000平方米，屋顶覆盖有瓦，是春秋中期规模大、等级较高的单体建筑。和秦雍城中宫庙区的马家庄一号、二号建筑群遗址相比较，遗址偏居城址东端，布局结构简单，无回廊、散水等设施，建筑材料不及后者尺寸大、工艺水平高，原建筑应该非宫庙类建筑。遗址规模、形制结构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21号建筑基址、秦咸阳城府库建筑遗址相似，这两处遗址均为秦的府库建筑遗址，时代分别为春秋早期偏晚、秦代，由此推测，此遗址也是一处府库建筑遗址。

通过考古发掘，对瓦窑头建筑遗址的规模、形制结构、时代、性质有了清楚的认识，修正了该遗址为雍城最早的大型宫室建筑遗址的观点，为了解研究秦雍城城市设施、布局、沿革及东周时期建筑技术提供了科学资料，同时为遗址保护展示创造了条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宝鸡市考古研究所 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 宝鸡市凤翔区博物馆 执笔：杨武站 王志远 张程 景宏伟 董海兵 陈爱东）



刻划文字、符号



半圆形瓦当



槽形板瓦



筒瓦



陶范



骨簪

重庆合川张家院子遗址考古收获

——嘉陵江下游首次发现春秋时期巴文化遗存

张家院子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湖塘村二社，地处嘉陵江下游左岸一级台地上，西北隔小溪沟与牛黄坝遗址相望，东南邻河坝院子遗址，西南临嘉陵江，海拔207~222米，分布面积1000平方米。

2007年7月，为配合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程立项，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嘉陵江流域工程建设区开展文物调查时发现张家院子遗址。2008年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勘探，基本明确了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分布范围。2022年4月至10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张家院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完成发掘面积675平方米，发现新石器、东周、汉至六朝、宋元、清代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沟、墓葬、柱洞等各类遗迹53个，出土各类器物小件、标本278件。现将主要收获简介如下。

地层堆积 遗址地层堆积东部较厚、西部略薄，主体堆积分布于发掘区东南部，可划分为12层。第1层为现代表土层。第2、3层出土有少量青花瓷碗残片、板瓦残片等，时代为清代。第4层为灰白色淤积土。第5层出土有零星泥质灰陶罐残片、黑釉瓷碗残片，为宋元时期。第6层出土有少量泥质灰褐陶、黄褐陶及夹细砂红褐陶片，可辨器形有钵、盆、盒、高领壶、高领罐、素口圆底罐、网坠、各种类型的花边口沿器（罐、釜、瓮），尤以花边口沿器为大宗。

主要收获 嘉陵江自古就是四川盆地沟通西北、西南地区与三峡地区的交通大道，也是联系成都平原与川东平行岭谷的重要区域。以合川为中心的三江汇流地区（嘉陵江、渠江、涪江），区位优势明显，是古代四川盆地文化交流的“洼地”，是探索巴蜀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近年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继在合川区猴清庙遗址、河嘴屋基遗址、牛黄坝遗址、菜蔬排遗址发现了一批石地坝文化时期的商周遗存，在厘清区域文化面貌上取得了重要收获。本次张家院子遗址的发掘，集中发现了一批东周时期的遗存，在嘉陵江下游巴文化考古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第一，科学获取了该组遗存的年代信息。从出土器物看，张家院子遗址F4出土的各种花边口沿器（罐、釜、瓮）、素口圆底罐、高领罐的特征，与巫山双堰塘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风格特点较为接近，发掘报告将双堰塘这批遗物的年代大致判定为西周中晚期，同类型的花边口沿器还发现于忠县瓦渣地遗址和中坝遗址；F4出土的尖底盏与嘉陵江下游临渡河与涪江交汇处的猴清庙遗址H14出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原报告将H14定为春秋时期。碳十四测年结果显示，遗址第8层的校正年代为778~538 cal BC(2727~2487 cal BP)、F4的校正年代为775~514 cal BC(2724~2463 cal BP)、第7层校正年代为571~404 cal BC(2520~2353 cal BP)。综合地层关系、器物对比分析及碳十四测年结果，认为遗址第8层和F4的年代为春秋早、中期，第7层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第二，确认了该组遗存的文化属性。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陶器群以各种类型的花边口沿器、素口圆底罐为代表，该组器物常见于三峡地区，可归入四川盆地东部的瓦渣地文化时期，属典型的巴文化遗存。

第三，填补了嘉陵江流域春秋时期巴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历年考古工作显示，嘉陵江流域发现的巴文化遗存的年代主要集中在商至西周、战国时期，春秋时期遗存仅有零星发现，本次张家院子遗址春秋时期遗存的发现弥补了这一缺憾，为进一步完善嘉陵江流域的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第四，该遗址位于三江交汇的合川地区，地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中上游、渠江上游巴文化遗存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其发现将上述区域有机串联，为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执笔：孙治刚 白九江）



张家院子遗址全景(上为东)

陶卷沿深腹罐(新石器时代)

春秋时期房址F4地表陶器堆积(上为西)

泥质陶。陶色以红陶为主，红褐陶、灰褐陶次之，有少量灰陶、黄褐陶、灰黑陶和黑皮陶。纹饰以中粗绳纹为主，少量素面，零星刻划纹。陶器可辨器形不多，可辨器形有尖底盏、钵、盆、高领壶、高领罐、素口圆底罐、网坠、各种类型的花边口沿器（罐、釜、瓮），尤以花边口沿器为大宗。

第五，该遗址位于三江交汇的合川地区，地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中上游、渠江上游巴文化遗存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其发现将上述区域有机串联，为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五，该遗址位于三江交汇的合川地区，地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中上游、渠江上游巴文化遗存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其发现将上述区域有机串联，为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五，该遗址位于三江交汇的合川地区，地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中上游、渠江上游巴文化遗存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其发现将上述区域有机串联，为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五，该遗址位于三江交汇的合川地区，地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中上游、渠江上游巴文化遗存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其发现将上述区域有机串联，为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五，该遗址位于三江交汇的合川地区，地处三峡地区和嘉陵江中上游、渠江上游巴文化遗存之间的关键节点上，其发现将上述区域有机串联，为深入研究巴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变迁提供了重要资料。

山东烟台考古首次发掘唐宋土洞墓群



土洞墓集中分布区



宋金墓葬出土铜镜



唐代土洞墓M20



唐代墓葬出土文物

为配合莱州市嘉麟·紫云台项目建设，做好相关文物保护工作，烟台市博物馆于2023年4月至6月对项目建设区内发现的墓葬等遗迹进行考古发掘。该墓葬群位于莱州市文昌路街道东关村东南，定名莱州东关东南墓地。墓地所处区域原为莱州市植物油厂，1983年建设厂房及水池时导致大部分墓葬被破坏，其中包括金代诗人刘迎家族墓地。现存墓葬很多已残存墓底。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分析，该墓地墓葬从唐代延续至明清时期。

田野发掘现已全部结束，共清理墓葬88座、水井6口、灰坑4处、窑址1座。墓葬以宋金时期为主，另有部分唐代、元代及明清墓葬，水井、灰坑以龙山时期和汉代为主，出土较多陶器、瓷器、铜器及滑石器等等。本次考古发掘墓葬延续时间长，墓葬年代从唐代到晚清未间断，且墓葬类型多种多样，同一时期包含多种墓葬类型。本次考古发掘的墓葬类型包括土坑竖穴墓、土洞墓、舟形砖室墓、仿木结构砖室墓、长方形砖室墓等，共发掘唐宋时期土洞墓34座，集中分布于发掘区西南侧，为本次考古重要发现。

土洞墓是流行于唐宋时期的一种墓葬形式，均为南北向，由墓道、封门砖及土洞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南侧，平面呈长方形，长约1米、宽约0.8米，底部略呈斜坡状，开口于地表。土洞墓室位于北侧，墓葬建造时最先在南侧挖出方形墓道，然后顺着墓道方向向北侧挖洞，形成土洞墓室，墓室底部平面近梯形，南宽北窄，北侧墓壁呈弧形，墓室一般长约2.5米、宽0.5~0.8米，墓室底部与墓道相同均为自南向北倾斜的斜底；墓顶挖成券拱状，也是自南向北倾斜，因挖洞难以掌握方向，有些墓室北部偏向西侧。封门砖位于墓道和墓室间，将木棺从墓道推入土洞墓室内青砖横向平砌或45°斜向平砌封门，有些封门砖呈弧形，现存封门砖2~10层不等，每层2~3块青砖，受墓室填土挤压封门砖上侧逐渐向墓室一侧倾斜。封门砖垒砌完毕后，将挖形成的渣土回填至墓道及封土，完成整个埋葬过程。因封门砖封堵，因此刚下葬时土洞墓室内并无填土。后期墓葬渗水后逐渐灌满淤土，形成墓道与墓室填土不同的现象，墓道为回填的黄土，墓室内为浅黄褐淤土。土洞墓葬具均为单棺，因土洞墓室较狭窄，因此木棺尺寸普遍偏小，大部分宽度为0.4~0.5米。人骨保存较好，均为仰身直肢葬，头向南、面向上。

唐代土洞墓和宋代土洞墓在随葬品上区别很大，这也成为判断土洞墓年代的标识。唐代土洞墓随葬品较丰富，随葬品数量少则4~5件，多则10余件，随葬品集中放置于棺外南侧近封门砖处及棺内头骨附近两处，棺外主要放置陶罐、瓷碗、瓷盏等盛器，棺内主要放置铜镜、铜簪、瓷胭脂

盒、铁剪刀等妆奁用品及常用工具。宋代土洞墓随葬品较少，大部分仅在棺外西南角或东南角近封门砖处随葬1件灰陶罐，部分女性墓在头骨处随葬有铜镜、铜（银）簪、铜（银）耳坠及铁剪刀。根据出土随葬器物判断，烟台地区土洞墓应为唐中期至金代的平民墓葬。

土洞墓的建造方式比较特殊，土洞墓室顶部为生土，仅墓道内填有花土，使其在考古勘探中很难被发现，当勘探到墓室顶部生土时一般就会停止向下勘探而错过；当勘探到墓道花土时一般能辨识出土层异样，但卡边时往往会因平面尺寸大小而否定其为墓葬。得益于大规模整体清表后墓葬分布更为清晰，烟台在近年考古发掘中陆续有土洞墓的发现。2021年莱州西关墓群考古发掘中清理数十座宋代土洞墓，但由于该墓群破坏严重，发现的土洞墓均仅残存墓室部分，土洞墓室上侧完全消失，因此未辨识出土洞墓形制，将其归入土坑竖穴墓；2022年莱州南关墓地考古发掘清理数座唐代土洞墓，未见宋代土洞墓。本次考古发掘第一周即清理数座保存较为完整的土洞墓，发掘人员因此对该类墓葬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地表只要发现南北向长方形花土遗迹或东西向2~3块平砖基本就可确定为土洞墓，因而本次考古发掘基本不会遗漏土洞墓。通过发掘人员认真寻找、仔细辨认，本次考古发掘共清理34座唐宋时期土洞墓，这些土洞墓集中分布于发掘区西南侧，均为建厂整地破坏后残留下来的，部分埋藏较深的墓葬保存较完整，很多埋藏较浅的墓葬已破坏殆尽，可以判断破坏前该区域土洞墓远超34座，尽管如此这也是烟台首次大规模发掘唐宋土洞墓群。

莱州东关东南墓地考古发掘具有重要意义，墓葬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末，墓葬延续时间长且墓葬类型多种多样，为研究莱州地区唐代至清代丧葬习俗、墓葬形制演变、文化内涵及其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土洞墓作为一种特殊的墓葬形制以往在烟台少有发现，本次发掘数十座较为完整的唐宋时期土洞墓，对于此类墓葬的构造方式、特点及时代特征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出土数件唐宋时期精美瓷器及滑石器，其中宋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刻菊瓣纹印花炉为山东地区首次发现，证明北宋时期湖田窑精品瓷器已远销山东。随葬滑石器的传统在莱州历史悠久，近年莱州城周边考古发掘唐、宋、元、明墓中多有发现，如西关墓群、东三岭子墓群、南关墓地及本次发掘的东关东南墓地等，这种传统在元代达到顶峰，元代八角形穹窿顶砖室墓随葬的滑石器往往成套出现，每套5~8件不等，包括碟、盏、瓶、杯、炉等，甚至仅随葬滑石器而不见陶器、瓷器，可能与当时战乱不断、民生凋敝有关。

（莱州市博物馆 烟台市博物馆 执笔：张英军 孙兆锋）